

■我的文学观

以诗歌的方式理解存在

□周幼安(满族)



周幼安,满族,1997年生于辽宁锦州,现居上海。著有诗集《荷花身》。

我时常觉得,我的写作是从一棵玉兰树开始的。那不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“开始”,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上的确认。在我生活过的许多个春天里,玉兰花如期开放,犹如仙鹤般轻盈、洁净,无意关心外界眼光,自有人为她驻足。每当我在树下仰望,看到那些肥厚的花瓣向着天空张开,像杯盏承接自上而下倾倒的一切,仅仅是全心全意地完成“绽放”,我便会感到一种深切的慰藉与满足。

这种慰藉,或许源于我从玉兰身上看到的绝对独立的性格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“可见性”的时代,一切似乎都需要在曝光与流量中得到验证,以结果评估过程的价值。但玉兰不是,它遵循的是另一种更为古老与本质的自然节律。

我愿将我的写作状态称为“玉兰般地写作”,这是一种对创作者身份的美好隐喻:坚持写作,并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,仅仅因为那是你生命内里的需求,而非为了任何外在的凝视与掌声。在写作将近十年的时候,我逐渐摸索到其中的道理。

1997年,我出生于东北一个四季分明的港口城市。我是独生女,不知道继承了哪位先祖的微弱天赋,在青春期迷上了阅读和写作,立志成为作家。本科期间,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趋势将我引入诗歌的宫殿,这门因含混、模糊、多义性而为理性世界带来困扰的艺术,以其惊鸿一面,让我看到了美与心灵的更多可能。在我大约十岁那年,东北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,我外出闲逛,从高台上跌进雪堆,整个人被松脆的积雪完全掩埋。一瞬间,世界消失了,只留下纯粹的寒冷、寂静、无限,我产生一种被包裹的、奇异的安全感。或许,诗神就是在那时出现,并行走在我身边。

对我而言,诗歌是一门同时属于过去与未来的事业,唯独与现在保持着距离。每当我们处理个人情绪,往往会陷入回忆,串联起相似处境下吹塑的彩灯,点亮一条通向记忆深处的灯带;而面对公共题材,诗歌总在尝试为未来预言,甚至需要克服集体观念的惰性、语言的窠臼。好像没有人知道现在要怎么做,这恰恰体现了诗歌的慷慨:它赠我以或热望或惊讶或审视的目光。

在成为一名诗人之前,我们首先是一个人。那么,一个由诗歌“培训”出来的、带有近乎强悍的主体性的人,如何在日益程序化,甚至带有强虚构感的现代都市中生活与写作?这个疑问为我的诗歌带来了必要的张力。自大学

毕业后,我就生活在上海,这里有令人惊叹的人类造物,也有被压缩和保护的自然生命。我常常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,观察路边的栎树、海棠、乌鸦和甲虫,它们在车流与高楼间寻找生存的缝隙,这种矛盾与坚韧并存的特质深深吸引着,让我不断思考何为“真实”,何为“继续下去”和“泰然自若”。现代生活愈发“程序化”,我们在这个微小的漩涡里循环往复,容易陷入一种机械化的晦涩与麻木状态,而城市中的自然之物,像玉兰,是唤醒我们的“闹钟”。从这个角度讲,一株墙缝中脱颖而出的青草的意义,远大于整片草原。

写作是破坏漩涡的行动。我有一首叫《程序崩溃日》的诗,就是对这种感觉的集中表达。假设世界是被某个粗心作家(比如福克纳)虚构出来又忘记的“约克纳帕塔法郡”,我们所有人仿佛都是其中的“非游戏玩家”,直到有一天,一个“程序漏洞”的出现令味道错乱、色彩变形,“我”才得以隔着水面,看清自己与世界“溃不成形”的真相。这个漏洞,就是艺术真实的入口。

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纠缠,但各行其是,因为艺术真实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,而是用心灵去重新感受、揭示那被日常程序所遮蔽的、更本质的真实。基于此,我近几年创作了“植物系列”“模拟器系列”诗歌,并将其作为长期主题。我渴望自己能写出植物本身而非概念上代表的永恒责任与对抗力量,并引申到个体成长、亲密关系中。而“模拟器”则是我从艺术真实的大门探头进入后,找到的一条鲜花小径。在分身乏术之时,我们常有模拟器游戏弥补这份寂寞。模拟器恋爱填充这份渴望,为何不能用模拟器诗歌完成某种“志存高远”的人生?

这种对人的处境与选择的痴迷,同样延伸到我对阅读和文学传统的看法中。诗歌以其强大的共情性穿越时空,让我关心历史中其他个体的存在。凭栏远眺,我拍遍的不仅是自己的栏杆,也是属于过去某人,乃至未来某人的栏杆。即使这种因感的内容是不同的,是细致到某个确切的问题的,但我非常信赖这个由成百上千的个体的困惑构成的集合词汇,它像一座大山坍塌在不同个体的生活之中。不同个体经验在共情中得到解释,寄蜉蝣于天地,天地又何尝不是成千上万的蜉蝣的想象?所以我时常会以优秀作品为前文本,或直接展开对某位历史人物命运的书写,如细读辛弃疾“泪落哀筝曲”的《秋日读稼轩词》、基于曹丕《大墙上蒿行》完成的《蒿行帖》、在阅读《诗经》后写作的《二子同舟,泛泛其景》。诗歌不仅帮助我确认自我,也帮助我与更广阔的世界联通——特别是与历史上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心灵联通。当我写辛弃疾的时候,我并不是为了还原一个历史人物,而是为了理解一种普遍的人类处境——那种面对无可挽回之事时的遗憾,以及在遗憾中仍然要走下去的尊严。

所有这些庞杂的思绪、断裂的感受、模糊的希望,最终都汇入了“诗歌”这一容器,就像我每一天都在不停感受、尝试理解那样。实际上,我们都知道文学没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哪怕一件具体的难题,但因为写作,我找到了一条对抗虚无、确认存在的路径,它带我走过烈日炎炎的荒漠,也走过芳香馥郁的森林。我二十岁出头时开始写诗,如今即将步入三十岁。回望这一路,我渐渐明白:要像玉兰般开放,把写作当作一种长久而坚定的、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律,不必过问其他人的季候。

在《蝉的语言》一诗的结尾,我写道:“或许语言/从来毫无意义,但总是响亮的。”这或许就是写作永恒的困境与驱动力。我们不断吞噬生活、转化经验、书写诗句,却似乎永远也填不满那个意义的缺口。但正是这种“响亮”,驱使我在心绪低回处仍能寻找到高昂的引领,对自己的存在和表达充满信心。



摩瑟西洛,彝族,2001年生于四川凉山。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十月》《江南诗》《星星诗刊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刊。曾获首届《十月》丁香诗会校园诗歌奖、“你好青春·华语大学生诗歌大赛”首奖等。

我记性很好,但也擅长遗忘,习惯通过遗忘去逃避一些事情。这一项“长处”,时常让我忘记我是一个因家境贫寒,三年级便辍学的农民工的儿子,时常让我忘记我出生自一个前些年才通电的边缘小山村。可是关于故乡,我总是有着许许多多无法忘记的往事,而写诗能短暂地按下时间的暂停键,帮我留下那些生命中的美好,就像把一些事放进漂流瓶里,多年后又捡回。

我出生在四川凉山一个叫“肖水平”的小村子。在我读初二那年,这个仿佛被人遗忘了许久的小村子,才通了信号、电源和公路。在此之前,我们要爬上山顶才能拨通电话,每次回村都要提着鞋袜,光脚蹚过湍急的河水。成绩优异的父亲因为曾祖母早逝,不得已辍学回家分担家务,后来父亲的同学都因为继续学业而有了一一个个让人羡慕的归宿。为此,抱憾的父亲在二十岁那年决定到县城打拼,为了我和姊妹们能有更好的教育条件。

童年的我时常往返于县城和村子。在我三四岁那年,我被托付给乡下的爷爷奶奶照顾,那时的我虽然年龄尚小,但留下了不少在乡下的记忆。每年春天,村里时常会出现一些汉族商人,用不太自然的彝语挨家挨户地问:“有没有头发?”他们总是背着一个竹编的背篓,里面装满了这个村子所没有的新鲜事物:糖果、崭新的剪刀、粘着金黄贴纸的盘子和贴着美图镜子。母亲用一团头发换了一个盘子,她说:“明年再来换这个镜子。”母亲和二姨偶尔也给我们一些头发,用来换糖。那时的春天是那样慢,要等很久很久,才能在一个寂静的清晨听见:“有没有头发?”

即将过年的时候,祖父就会背着我和弟弟,走两公里路给我们父母打电话。弟弟说着说着就哭了,母亲答应我们回来时要给我们带新衣服。外婆忙完家务后,就会坐在路边,村主任告诉她,她的小女儿就要从外地回来了,她一坐就是一个下午,一个星期,半个月。小姨成家后,每年火把节结束,她又坐在路边,等她的外孙们。返程回家时,我从车窗看见她越来越小的身影,仿佛这一生都在等待。这些事情总萦绕在我的心中,不因岁月的变迁而消散。

我后来想,我写诗,有时也因为生命中有太多的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”,需要在阅读和写作中得到抒发和排解。写诗是一种“悟道”,我在对万事万物的感悟中获得启迪和力量,从而变得从容、释然和旷达。我第一次有写诗的冲动,是在一次去宁蒗拜年的途中。接近傍晚,雨下得很大,母亲说起关于祖母的一些事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像一棵干枯的梅树般的祖母竭尽所有的力气,推开了母亲,只因她听人说,不能靠在八字相同的人的怀里去世,否则那人就会厄运缠身。

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,我靠着车窗,眼泪不自觉淌了下来,只觉眼前模糊一片。

为记忆里的人和往事画像

□摩瑟西洛(彝族)

我想起最后一次见祖母。屋里,祖母躺在亲人怀里有气无力地叮嘱着自己的后事;屋外,梅树也落着最后的几片叶子。祖母已经不能走动,说话也不利索了,甚至咽不下任何东西。父亲坐了一会,终于忍着泪水走了出去,坐在一块石头上。我坐在他身旁,说不出话。

社会发展了,肖水平村的村民陆续搬离了那个偏僻的小村庄,而祖父因为要帮着么叔放羊,又回到了那里。群山间坐落着的木屋都空了,像被蛛网永久查封,不再有人回来。从前,山里人们的喊声回荡在群山间,此起彼伏,而如今祖父只能自顾自地抽着旱烟。许多年后,更多的木门需要面对时间、永恒和虚无,任山风寂寂地吹拂,之后生命中所有的幸福都让我回想起这里。

前两年的国庆假期,我从学校回到县城家中。父亲承建了几户人家的房子,急走在砖瓦上,挥舞斧头劈砍着木椽,母亲和我负责递送木料。因为忘记携带工具,我们焦头烂额。一旁一个两鬓斑白的伯伯跟我们说,他那里工具齐全,差什么拿就是了。我将一根巨大的圆木递给父亲,那木头是那样重。运送途中,我摇摇晃晃。就在我觉得即将倒地时,一双布满皱纹的手掌稳住了那根巨大的木头——那个陌生的伯伯伸出了双手。那一瞬,“那双手掌就像大地般沉稳而慈蔼”。

大学期间,我读到了吉狄马加的《母亲们的手》《达洛沙基故乡》,读到了草树的《淤泥之子》、刘春的《我写下的都是卑微的事物》、张二棍的《搬山寄》,读了鲁若迪基的《小凉山很小》,读到了谢默斯·希尼的《开垦者》、特朗斯特罗姆的《沉石与火舌》……我发现那些触动心弦的、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的、萦绕在心中却又不起眼的细节就能够构成诗意,里面其实暗藏着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,具有能够打动人心的力量。于是,我试着写下了《春天》《割养的母亲》《松林是如此静谧》《布满皱纹的手掌如大地》等诗,这些诗稿像一张张简短的日记,替我保存着生命中的美好;也像是一块块拼图,共同组成了我记忆的故乡。

海德格尔说:“诗人的天职是还乡。”写作即是“纸上还乡”。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出发之地,文学创作的永久母题,更是心灵的终归之所。每当我提起笔时,这些有关故乡的往事就会充斥我的脑海,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时常想起,从未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在割养时说出“如果不能在露水蒸发之前完成收割,养麦里的养分就会干涸”这样充满诗意的话语;还有因胃痛抱着肚子蜷缩在沙发上的父亲,夜里睡不着哀号,次日清晨又准时去工地上班。

我试着将这些生活中的往事写进了诗中,用文字画出记忆里的图景,写故乡就像为记忆里的人和往事画像。有时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诗人,我只是故乡的一个转述者,故乡的生活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和诗意。

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,我想用诗对抗时间的量变,为那些曾出现在我生命中的、珍贵的人和事画一张画。

■编辑手记

我们望到的,是一样的风景

□许 艺



高级研讨班认识的第一位同学,我告诉她,那是在编辑部打出的第一个电话,我们编辑部在北京中路57号,过街便是银川市唐徕中学,每天按时响起的广播体操音乐让我无限怀念校园,“教师是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职业”。

“文学也是!”庆慧说。她说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后,兴冲冲去街上摆摊卖书,还备了好几支签名笔。然而,没有“洛阳纸贵”,只有“门可罗雀”。我们为一种熟悉的幼稚和傻气放声大笑。她说这迫使她重新认识文学,剔除一切之后,“依然热爱”。庆慧是侗族,从小生活在村寨里,体验过城乡文化的对撞和传统观念的变迁,工作以后重返基层,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来时路。她有很多关于大山、侗歌和农业种子的动人故事,她讲的故事和她的善良、淳朴、坚毅、乐观缠绕在一起,格外动人,也格外值得期待。陆陆续续读了她的一些作品后,我送审了其中的一篇,小说讲的是看过了世界的理想主义者重返村寨,姑巴节的歌谣最终融化了女主人公心头的坚冰,传统的价值再一次被确认。

2020年底,主编杨梓决定开设“此在”专栏和“新锐”栏目。他是一名诗人,总能把编前会开得热烈澎湃:“宁夏文学该怎样创造第三次辉煌?《朔方》作为宁夏文化名片、西部原创高地,又不容辞也责无旁贷!”作为编辑部当时最年轻的编辑,“新锐”栏目交给了我,让我倍感激动和压力。栏目定位是挖掘既“新”且“锐”的写作者,稿件质量要远高于本刊发表标准方可考虑。于是,作为新手编辑的我无头苍蝇一般开启了全国搜索模式,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刚冒头却还没什么名气的文学新人。是的,就是那种我刚好欣赏你,而你也恰好中意我的故事,和车站邂逅、情定终身的爱情故事有着某种迷人的类似。

2021年第1期,“新锐”栏目推出了王文写民间科学家的中篇《俯仰陈迹》,该作次年获第五届《朔方》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再一年,我看到王文的名字陆续出现在名刊大刊。第2期推出了周于扬的《云顶司机》,很快被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连载。周于扬开心地告诉我,这是他第一次被选载。之后很快他出版了小说集《马孔多在雨下》,

并于2022年入围宝珀文学奖决选名单。2021年,“新锐”栏目一共推出了13位青年写作者,第12期用80个页码一次性推出了兔草、王明明、蔡泽宇等9名新锐作者。

一个风雪天,我独自在编辑部打印样刊邮寄地址,一条条裁下来,贴上牛皮纸信封。临近下班,光线越来越暗。直起腰从26楼的窗口望出去,北京中路的车流人流按着红绿灯的节奏流淌或停顿,我不由得想,这一眼望见的人里,或许没有几个人是我们的读者,但文学会一直在我们身边。当时,我忽然非常想念即将退休的漠月主编,他累了会站在这个窗口向外望,有时和我聊几句,有时什么也不说,我也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望着窗外。再后来是火会亮主编,他也喜欢垂着双手,望一望窗外。我们望到的,是一样的风景吗?

那年之后,我便经常能收到陌生作者的来稿,邮件主题会注明要投“新锐”栏目。有人转来小红书里的截图,是写作新人们的留言,说《朔方》的“新锐”栏目会看自由来稿,没名气的新人也会给发稿子。我心稍安,希望自己没有辱没那

些我未曾谋面却心怀敬意的前辈们。

彝族的加主布哈也留给我很深的印象。他第一次投稿的作品没有过审,但他的语言有着彝语与汉语碰撞后的独特滋味,我便又约了一篇。打电话改稿的时候他正在大凉山老家,鸡犬之声先于他的语音传过来,我仿佛瞬间就坠入了他小说里的场景,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青草、山野和牛羊。那篇《工人》顺利刊出,编辑部的老师都很赞赏那篇小说。次年,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《阿古,阿古》,很快被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转载。后来,每次想到童年时期睡在姑妈家屋顶上完成求学之路的加主布哈,我都会先想到那一通散发着阳光气息的电话。广阔的大地上,总有带给我们惊喜、力量和美好的人,乘着文学的舟楫远道而来,我们相遇,交换温暖与鼓励,又各自远行。

一个脱颖而出的青年写作者留给普通省刊的时间和缘分是很有限的,但在恰当的时间里,我们相遇并彼此成全了,就是最美好的瞬间。我曾偶然看到王晚在《跑外卖: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的作者简介中写着,有作品发表于《朔方》。霎时间,一种特别的情谊回溯时间之河扑面而来,让我想起打电话找她改稿的时刻。后来,我向主编闫宏伟请示:“可以给王晚做一期访谈吗?”他爽快地回答:“当然可以!我们发现了新人,就要持续关注,助力他们能走得更好、更远。”

2023年,编辑部迎来了两位优秀的年轻人,其中一位来自山东。我问她一个人跑这么远,家人放心吗?她说:“不放心。哪怕我考中的是省里的公务员岗,我也可以放弃了回老家再考,但这是《朔方》啊!上中学的时候,语文老师就说过《朔方》。这么多年了,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养成一个纯粹的文学灵魂,不配涉足文学创作。但我竟然有机会来这里当编辑。你说,我怎么能走呢?”

那一刻,我再一次想起庆慧说的,文学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。她还说:“依旧热爱。”

(作者系《朔方》编辑)